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核心要义

□ 肖立辉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党带领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智慧结晶，是我党的一贯主张和优良传统。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在敌强我弱总格局下，赢得全局战争的胜利，取决于一个又一个局部战争的胜利，而打赢局部战争的法宝是变总体弱势为局部强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一思路充分体现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体现着局部与整体的衔接、弱势与优势的转换、短期战术目标和长期战略目标的切换，其主要目的就是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利于矛盾的解决和目标的达成。

国家的力量为什么要集中，不集中有什么坏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解释这种制度优势与我们的国情之间的关系。我国的国情，简单来说，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但从供给侧来看，我们的发展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原因。集中力量办大事，既是我们的体制优势，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的现实需要。其原因在于，目标的多样性和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赶超型的国家发展战略，发展的紧迫性；另一方面，超大规模的国家体量，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各区域之间、各行业之间、各领

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又要求我们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要求我们秉承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发展理念，互帮互助，取长补短。以上诸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必然要求我们只能集中有限的资源、有限的精力解决当前最为紧迫、人民群众最为关注最希望解决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在中央的统筹下，有序推动各地区的协作发展、各民族的团结友爱，形成合力，国家力量由此得以集中，各方面资源由此得以整合，各种大事也由此得以办成。

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字面来理解，两个动词（集中、办或办理）、两个名词（力量、大事），由此引出四个问题。

一是“谁来集中”。在全国层面，毫无疑问，是由中央来集中。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和制度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既是全面领导的党，也是长期执政的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首要的一点就是由中国共产党来集中，由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组织来集中。因此，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就要求全国范围内各方面的力量，即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只能由党中央来集中，统一指挥、统一调配。

二是“集中什么力量”。通俗地讲，就是人力、物力、财力。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医护人员、社区力量的统筹与调动，医疗物资、

生活物资的调拨与分发，财政金融的安排与支持，都属于“集中”的对象。另外，还有人民的精神力量、媒体的力量，都需要动员起来，聚焦为一点，进行发力。在这所有的力量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人力。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中，广大的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冲在第一线。全国有53万个村民委员会、11万个社区居民委员会、468万个党的基层组织，据统计，投入到这次防疫一线的社区工作者就达到430多万。没有医护人员的火线工作、社区工作者的一线努力，我国防疫形势的根本好转不可想象。反观欧美西方发达国家，基层社区基本上处于悬空状态，尽管有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参与，但工作力量远远不够，再加上医护人员不能被集中和统筹调配，导致目前的状态是各自为战、自顾不暇。

三是“办理何种大事”。大事，一定是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大事，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健康福祉的，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大事。有些事情，现在只带有苗头性倾向性，但一旦处置不当，会引发为重大突发事件。为此，要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提高风险处置能力，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转换通道。对大事的判定，对有可能演变为大事的提前预判，不仅要有尊重科学、尊重专业的科学精神，而且也要具备敢于决策、善于决策的政治胆识。

四是“如何办理”。既然是办大事，就需要创设办事的议事决策机

构，进行科学的分工、强有力的督导，以及周密细致的过程管理。决策之后，就是执行和执行过程中的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日益成熟，果断快速的执行、强有力的问责，保证了大事办理过程的顺畅和有效。

另外，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关联内容来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离不开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两个方面的支撑，也可以说，这三个要素构成一个体系。在国家治理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坚持全国一盘棋，就是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把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基层，当前与长远，个人、集体与国家，区域之间、民族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各方面都要放在系统的框架之下加以统筹。为什么要强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呢？这是因为如果处置不当，各方面为了局部利益、短期利益、当前利益会陷入不当竞争、内耗，就会降低总体的治理效能。只有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才能扬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整体合力。



魏明帝太和二年，也就是公元228年，曹魏和东吴在安徽桐城的石亭发生了一场大战。战前，东吴的一线将领朱桓向主帅陆逊建议，在曹军必经的石亭预设伏兵，待其后勤撤时来个前后夹击，料能必获全胜。没想到陆逊没有采纳，结果曹军虽然大败，但主帅曹休得以全身而退。这是陆逊的眼光不如朱桓吗？当然不是。陆逊认为，如果这次让曹休全军覆没，他们与曹魏之间的局部战争必然升级全面战争，凭东吴时下的实力怎么也扛不住。此时，在川蜀的诸葛亮闻悉后立即组织北伐，虽有人以“劳民伤财”为由反对，但他以“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的紧迫感，毅然拔挂出征。而曹魏内部呢，自曹休败降下来后反而消停了，停战声成为了主流，原委是他们实力最强，耗都能把另外两方耗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三方在战与和的问题上，实力与态度成为反比例关系：实力最强，安静是最优方案；实力越小，越是要主动出击找出路；实力居中的，只能见好就收。

透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三国时期在各方发挥核心决策作用的统帅们不仅是军事家，而且是战略思想家，他们能跳出战争来指挥战争，善于从全局上思付得失、把握关键、驾驭趋势。这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要成为一名有作为的卓越领导者，必须要有自己的思想；反过来说，卓越的领导者首先应该是一位思想者。

领导力的本质是影响力，就是影响别人去实现一个特定目标的能力。卓越的领导者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是因为他们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芸芸众生之所以跟随他们的脚步，是因为深受他们思想的影响。其实，影响别人的方式有很多，可以采用强制手段，或者通过职位所赋予的权力，采用命令的手段让别人去执行，但这些都属于管理技巧的范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力。真正影响别人的能力，来自于思想。形式上的领导是短暂的，行为上的领导是小范围的，只有思想上的领导，才是长久的、广泛的、深入的、刻骨铭心的。这就要求领导者必须富有想象力且善于直觉判断，富有创造力也感觉敏锐；既有优秀的创意，也有难以言计的预感；既有敏锐的洞察力，也有突然闪现的灵感。说白了，就是思想力。就像当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规律、对中国发展前途、对世界发展大势，总是比别人看得更远、想得更深、讲得更透，归根到底就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个望远镜、显微镜，运用得比別人更加自觉、更加自如。

回望历史烟波，我们清晰地看到，一流的领导者通常具有洞若观火的理论眼光和博古通今的大智大慧，带领部属朝着共同的目标开拓奋进，使队伍始终保持一股向心力。不可否认，领导者的思想力以及意志力，对建设一个国家会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某些特定时刻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巴尔扎克说过：“一个能思想的人，才算是一个力量无比的人。”同样，一个卓越的领导者就是一个思想者，光有某一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个有深邃思想、深刻理论的人，才会心灵通透、精微高远、广博深邃；才会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散发出独特的人格魅力。现在，我们干部队伍中爱思考、勤钻研的同志很多，他们所带的队伍和所从事的工作总是红红火火，但也有少数“思想懒汉”，平时习惯用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格式化的套话、场面上的应酬话来打发日子，工作上毫无思路和创新之举，值得高度警惕。毛泽东曾经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

□ 顾伯冲

卓越的领导者首先是思想者

义”，就是思想上的成熟。当然，这个任务今天依然很现实地摆在我们党面前。

强调思想在领导实践中的作用，要把握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所谓“思想者”并不是“思想家”。强调和鼓励领导者成为思想者，不能要求所有的领导者都去“啃大本本”，都去研究学术问题，而是对人生、对世界、对事业有自己正确、独到见解并形成一相对完整概念体系。二是思想者不一定是卓越的领导者，领导者也不一定是思想者。但一个卓越的领导者，必定同时是一个思想者。

那么，领导干部的思想从哪里来？毫无疑问，从学习中来，从实践中来。要自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静下心来学习原著，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与此同时，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逐步培养自己透过现象看本质，同中看异、异中看同的思维方，始终做到站得高、看得远，讲全局、抓本质。可以说，思想是人们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是思想者长期“吾日三省吾身”的结晶。毋庸讳言，一位领导干部有没有思想，思想水平高低，并不完全是其本人的事情，各级组织要用好选人用人导向这根“指挥棒”，大胆培养使用那些有思想、有个性、有担当的干部，释放“进贤退庸”的正能量，这是造就更多思想型的卓越领导者最有效、最直接的激励。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讲得就是这个道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建设的三个维度

□ 李立峰 徐岑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这不仅是巩固发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迫切需要，也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迫切需要，更是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基础的迫切需要。

尊崇制度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石。形成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的整体，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必然要求。而这样的整体，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靠不住。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剖析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强调，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列宁批评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时指出，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愈发复杂的世界格局变化中，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面对诸多时代问题，“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看，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的思想自觉，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的关键。同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建设就是要确保全党遵守党章，恪守党的性质和宗旨，坚持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工作，夯实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更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到知行合一一是其关键。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不断完善“两个维护”的制度机制建设，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等党内法规。

学习制度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建设的重要依托。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



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党员干部要带领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就必须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些理论的科学内涵、根本要求。党内集中教育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教育实践形式，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从历史角度来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整风运动”，是第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伟大实践，开创了党内集中教育的先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又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一系列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为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坚持不懈锤炼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这意味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被纳入常态化、制度化的轨道。必须深刻认识

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每个党员都要在思想政治上不断进行检视、剖析、反思，不断去杂质、除病毒、防污染。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学习制度，推动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

执行制度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建设的根本保障。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人们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所作出的主观性安排，必须落实于实践才有意义。也即是说，制度的生命力只有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才能得以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制度对党的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影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建设，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使一切工作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发展规律、体现人民愿望，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得到人民衷心拥护。这意

味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建设，不仅要以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价值依归，还必须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实践依托。从主观层面看，提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执行力，需要党员干部带头维护制度权威，争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在看到违反制度的现象时，敢于坚持原则、敢于亮剑，促进全党、全社会上下形成自觉尊崇制度、执行制度、维护制度的良好风气。从客观层面看，提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执行力，不仅要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坚决杜绝绝对制度执行时作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同时还要健全相关的问责机制，坚持做到有责必问、问责必严。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充分彰显了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与监督执纪问责紧密结合的要求，是进一步提高党的制度执行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建设的重要保障。

专家视点